



曹元忠、曹延禄父子两代与于阗政权的联姻

王使臻

(陕西理工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摘要:五代宋初之际的曹议金、曹元忠、曹延禄祖孙三代都曾经与西域于阗政权进行过政治联姻,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遏制了甘州回鹘政权向河西走廊西端的扩张,而且要借助于阗政权的力量去开通向中原政权朝贡政治之路的通畅。本文利用敦煌文献,采用文献细读的方法,将呈现碎片化的曹氏归义军政权曹元忠、曹延禄与于阗的联姻线索,试图进行实证性的梳理,尤其是解释了促成归义军与于阗联姻的政治因素。

关键词:曹元忠 曹延禄 于阗 联姻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52(2015)02-0027-16

曹氏归义军政权建立之初,便受到来自河西走廊东端的甘州回鹘民族政权的巨大威胁,打通甘州回鹘政权对河西走廊朝贡之路的阻断并保持向东道路的通畅,一直是曹氏归义军政权经营河西走廊的首要施政方针。为此,任职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时间最久、政权最为稳定的曹议金、曹元忠、曹延禄祖孙三代,对甘州回鹘采取了既斗争求存,又联姻遏制的策略,其中曹议金三代与西域于阗国的政治联姻最为引人注目,也最为成功地遏制了甘州回鹘政权向河西走廊西端的扩张。敦煌文献中对曹元忠、曹延禄父子两代和于阗国联姻的记录不多,资料呈现片面化特征,本文旨在利用敦煌文献,采用文献细读的方法,将呈现碎片化的曹氏归义军政权与于阗的联姻线索,试图进行实证性的梳理。

一、曹氏归义军政权与于阗政权的首次联姻及其后果

曹氏归义军政权与于阗国的首次联姻出现在曹议金时期,这是学界公认的基本历史事

收稿日期:2014-12-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出土唐五代公文整理研究”(13XZS005)

作者简介:王使臻(1976-),男,甘肃永登人。讲师,中国史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学、历史文献学、唐宋地方史研究。



实。但为什么会出现曹议金嫁长女给于阗国王李圣天的局面^①而不是相反的局面?这当然与曹议金面对唐末以来河西走廊内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外部地缘政治形势密切相关,是曹议金利用“二个联盟”的政治策略的必然选择。所谓“二个联盟”,一是指曹氏归义军利用与河西走廊东边凉州、灵州诸中原藩镇之间的传统友好联盟关系(简称东方联盟)对甘州回鹘的牵制作用;二是指归义军利用与沙州以西的于阗国的政治姻亲关系(简称西方联盟),加强对甘州回鹘向河西走廊西端的军事扩张的遏制,从而保证归义军政权的整体安全。但随着曹议金去世之后河西走廊内的地缘政治局势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在中原政权频繁更迭的五代,东方联盟诸藩镇尚且要自保安全,对甘州回鹘牵制作用的减弱,西方联盟对归义军政权的重要性便更加凸现出来,尤其是在曹元深、曹元忠主政归义军时期,借助于阗国的军事力量,以及跟随于阗使团朝贡中原从而使朝贡之路不会因为甘州回鹘政权的阻隔而中断所带来的巨大政治利益,正是曹议金时期第一次联姻于阗国的重大政治后果的显现。

曹元深继任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后,巧妙地借助与归义军有姻亲关系的于阗国王李圣天的力量,派出使者高文超^②等使人通和与甘州回鹘之间因曹议金去世之后而趋于战争的紧张关系,甘沙关系才有所缓和。P. 3197V (6)、(7)《某年二月归义军甘沙通和使文端等上归义军留后状》则是某年二月份^③归义军留后、检校司空派往甘州的使人向其报告在甘州的所见所闻的公文报告。传世文献和敦煌文献显示^④:后晋天福四年(939)六七月间,司空曹元德患病,十二月时曹元德身亡。也就在此年的冬月,后晋

① 在S. 6417《燃灯发愿文》中称“伏惟我府主太保(中略)恬静六戎(中略)故得南蕃顺伏,垂肱跪膝而来降;北狄归心,披带拜舞而伏款。东开洛驿,朝恩频赐而宠荣;西夺昆仑,戎王图真而顶谒”。文中“府主太保”是指后唐同光至天成年间称“太保”的曹议金,归义军二次出兵攻打甘州回鹘并使之降服。文中“戎王”指的是昆仑山下的于阗国王李圣天,在曹议金击败甘州回鹘之后不久,前往敦煌“拜谒”曹议金且绘图纪功,曹议金始嫁女给于阗王。S. 5957《结坛祈祷发愿文》中有一段完全相同的称赞文字。

② S. 1769V有一条封题,抄写在纸背面的二纸之间的接缝处:“第(第)子甘沙通和使 高文超状封”,表明高文超并曾作为甘州和沙州之间的通和使。

③ 以上二件书状,吴丽娱、杨宝玉曾经校录并研究,推断是后唐清泰二年(935)正月时归义军派出使者出使甘州,为通和沙州朝贡使团梁善德被害事件(参见吴丽娱、杨宝玉《P. 3197V〈曹氏归义军时期甘州使人书状〉考释》,《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4期,第14页),其文主要依据是某年十二月甘州回鹘“陈愿成都督般次入奏回”与史籍中记载的清泰二年七月时回鹘都督陈福海朝贡后唐一事相符合。但根据敦煌文献所反映出的归义军的历史及历任节度使称号,笔者的看法与吴、杨的看法不同:甘州回鹘派出的使者是都督“陈福海”,状文中的都督名“陈愿成”,难以肯定这二位同姓的陈都督为同一人。而且学者们对归义军史的研究已经证明,从936年以后直到曹元德去世的939年,甘州回鹘完全阻隔了归义军向中原进贡的道路,河西走廊道路开通的契机出现在938年九月于阗使马继荣等首次进贡后晋之后,随着于阗势力的崛起,使归义军能够借助与于阗国王李圣天的姻亲关系而向西寻求结盟,以共同对付甘州回鹘的威胁。故状文中提到的“于阗有一伴使人到,经沙州,扬于阗兵马来向甘州作贼”只能发生在938年九月于阗使人进贡以后。根据书状中透露出来的时间“二月份”,结合天福五年(940)三月、四月后曹元深继曹元德为归义军节度留后,且自称“检校司空”,一直到天福七年(942)七月时,曹元深才自称“司徒”的时间,当以941年二月或942年二月为较为合理的推测,笔者更倾向于942年二月,因为在此年的秋冬之际,于阗使团刘再昇和后晋朝廷张匡邨使团一同到达了后晋。

④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0-111页。



朝廷派出使者张匡邺、高居海出使于阗国，册封于阗国王李圣天。当后晋使团到达沙州时，曹元深代患重病的曹元德为沙州刺史，迎接张匡邺一行使人。故 P. 3197V (6)、(7) 归义军“司空”遣使到甘州通和，只能发生在 940 年到 942 年之间曹元深为归义军留后期间，“司空”极有可能就是归义军留后曹元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件状文中归义军使团向曹元深报告的于阗国使者在甘州的详细情况，其中提到“其月十一日，于阗有一伴使人到，经沙州，扬[言]‘于阗兵马向甘州作贼’”，解读其内容显然是于阗国所派出的使团到达了甘州，不满于甘州回鹘政权阻隔了向中原朝廷朝贡的河西走廊道路，于是扬言于阗国的兵马要来攻打甘州，以武力相威胁甘州回鹘。这种军事威胁似乎起了作用，因为依据状文显示出来的信息，甘州回鹘可汗接受了归义军方面的通和要求，同意将前后在河西走廊内所隔勒滞留于甘州的沙州使人全部放回，可能就是于阗国对甘州回鹘政权施加压力的一个结果。于是，归义军节度留后曹元深凭借着和于阗国的首次政治联姻关系开通河西走廊的努力开始出现了一丝曙光。

P. 3197V (6)、(7)《某年二月归义军甘沙通和使文端等上归义军留后状》显示 942 年二月曹元深借助于和于阗政权的姻亲关系，终于使曹议金死后一度十分紧张的甘州-归义军关系缓和之后，天福七年(942)秋冬之际，沙州使臣跟随张匡邺、于阗使刘再昇进贡后晋朝廷，在隔绝了数年之后，于本年年底到达后晋朝廷。天福八年(943)正月，后晋朝廷便派出朝廷专使加曹元深检校太傅、正授归义军节度使，并加封逝去的曹议金、曹元德官衔^①。943 年二月，曹元深曾写信给甘州众宰相^②，请放行后晋朝廷派出的旌节、官告、国信使者顺利通过甘州西来沙州，授予曹元深归义军节度使旌节和官告，河西走廊向东的朝贡道路终于再次开通，这种结果完全就是曹议金时代归义军政权和于阗国政治姻所带来的巨大政治利益遗产。

曹元深利用归义军政权和于阗国的联姻关系对甘州回鹘施加压力，保持河西走廊的畅通，而且将归义军的朝贡使团附庸在于阗国的使团之内前去朝贡中原朝廷的做法，在曹元忠时期完全得到了继承。曹元忠时期，河西走廊的朝贡道路仍然常常被甘州回鹘政权所阻断。曹元忠仍然利用和于阗国之间的联姻关系，依附于于阗使团，在后周建立之后派遣使团前往河西走廊、于阗国宣谕的机会，开始寻觅河西走廊再度出现开通的契机。P. 4889《呈司空的口号及序》中提到：今则我当今皇帝临轩西顾，照绝塞之庶民，远遣使臣宣圣猷于边上（中略）况说龙沙遐边陲，开河阻障远明时。蕃戎任险割□□，何日申奏圣人知。今遇司空来宣问，枯林滋润再生枝。四面六蕃多围绕，伏恐辱常失朝仪。若不远仗天威力，只怕河湟陷戎夷。请须司空奏论事，封册加官莫改移。比至来秋朔同陞，山林草木总光辉。塞上艰葦无处说，一心目到望□堦。”文中提到的“司空”

① P. 4065《归义军曹元深上后晋皇帝表稿》：“旌节官告国信使副某至，奉宣圣旨，赐臣手诏一封，赠臣亡父官告一道、告身一通、焚黄一道，故兄赠太保官告身一通、告身一道、焚黄一道者”。

② P. 2992V (1)《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曹元深上回鹘众宰相状》。



与 S. 5860《后周广顺二年(952)五月甘沙瓜肃宣谕于阗国礼使右领卫将军侯延超功德疏》有极密切的关系,该疏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伏以司空台衙,
帝命抚谕,千?煌淹近?途路
未有思?明□,直是坊□□□
(中略)
乃表白。谨疏。

广顺二年五月日功德疏

[甘、沙、瓜、肃宣谕于阗国礼使、右领卫将军侯延超]①

上述功德疏文表明,后周广顺二年中央朝廷派出将军侯延超,前往河西走廊宣谕甘沙瓜肃四州以及西域的于阗国,侯延超的检校官可能就是司空,即 P. 4889《呈司空的口号及序》中的“使臣司空”。曹元忠利用后周宣谕河西、于阗的契机,远仗后周天威之力,谋求开通河西走廊道路。归义军派出的进贡使团中的部分使者于本年十月(也就是 P. 4889 中所言的“比至来秋朔同陞”,字面义言希望来年秋天时边陲的敦煌与中原朝廷实行同一正朔,意即希冀后周朝廷对归义军政权进行正式的册封)终于到达了后周朝廷,诉说回鹘阻隔归义军使团的情状②。后周显德二年(955)曹元忠获得归义军节度使旌节,必与广顺二年侯延超这次出使宣谕甘、沙、瓜、肃、于阗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

二、曹元忠与于阗政权的再次政治联姻

曹元忠利用与于阗国的政治联姻关系,于显德二年五月终于再次成功进贡后周朝廷,后周以“沙州留后曹元忠为沙州节度使,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正授归义军节度使旌节③,并铸赐“归义军节度使新印”、“瓜沙等州观察使新印”,旌节和官印从中原传入敦煌。但不久,归义军进贡中原的道路再次被甘州回鹘政权所阻断,归义军使人被隔勒在甘州,不放沙州使人入贡中原。P. 3556《显德六年(959)曹保昇牒》记载“去载”(958)归义军差曹保定入奏,在甘州“被打破般次身亡”,即是甘州回鹘阻断归义军朝贡之路、劫杀归义军使团人员的证据之一。河西走廊朝贡道路被甘州回鹘的阻断不通的政治现实,促使曹元忠进一步加强了与西边于阗国的政治、姻亲关系,可能也在这时候,曹元忠有了与于阗国进行政治联姻的打算,这在 P. 3016V 中也许已经显示出了

① 此行文字书法、字体颜色均和前文功德疏的字体不一致,推断应当是后人所添加,与功德疏中的主人公有密切的关系,或许就是暗示疏文中的司空即侯延超,因路途艰难,故于敦煌进行施舍,以求道路平安。

② 《宋本册府元龟》卷 980《外臣部·通好》:(广顺二年)十月,沙州僧兴赞表辞“回鹘阻隔”,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

③ 《宋本册府元龟》卷 170《帝王部·来远》。



某种蛛丝马迹。

P. 3016V (2)、(3) 二件书札是归义军派往于阗的使人在于阗年号天兴七年^①归义军进贡于阗的使臣索子全、天兴九年出使西朝的走马使富住从于阗传递而来、上给归义军节度使府衙内都指挥的书状原件，向其报告在于阗进贡时面见于阗皇帝李圣天、曹皇后的详细内容及细节。P. 3016V (2)《于阗天兴七年(956)于阗回礼使寿昌县令索子全状》“回礼使”三字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证明在956年之前，于阗政权曾经派出使者到过沙州，有过某种“礼”，而沙州才会派人前去“回礼”，且进贡了大量礼物，包括进贡给天皇后曹皇后的“内殿箏妓”等侍女，还有充实于阗国太常寺的乐人。笔者认为，在955年曹元忠在得到后周朝廷班赐的归义军旌节、官印之后，于阗政权也更加重视同归义军的关系，也许派出了一支使臣队伍，与恭贺归义军得到中原朝廷的正式任命有关。因此，曹元忠随之在956年七月七日^②派出索子全使团“回礼”进贡侍女与乐伎，更进一步加强了与于阗国的传统姻亲关系（于阗王称“朕国之血属”），索子全使团直到958年五月才离开于阗返回了敦煌。但此时，曹元忠尚未迎娶于阗公主。笔者猜测，也许在这时，曹元忠可能已经提出了迎娶于阗公主、再次进行政治联姻的要求，所以才会派出使团前往于阗回礼、进贡而且逗留达二年之久的一个主要原因吧。P. 3016V (3)《于阗天兴九年(958)沙州使富住状》可能与曹元忠派出使团前往于阗进贡兼请求于阗王下嫁公主有关系，文中称在958年季秋（九月），富住以归义军府衙内亲侍都头的身份作为走马使带领一行使团出使于阗，并携了大量进贡给于阗王的“国朝信物”，非常可能是继索子全使团而后再次提出了迎娶于阗公主、再次进行政治联姻的要求。另，值得注意的是，笔者认为索子全状的内容是上给归义军政权内担任都押衙等职务的曹氏子弟的“外交情报”，状文中对于阗国王对归义军进贡的态度、反应和曹氏天皇后在于阗国的地位和受信任程度，作了极其详细而生动地描绘，反映了归义军十分重视与于阗之间的传统姻亲关系，以保证归义军政权的安全。

公元960年，中原建立宋朝之后，沙州与宋朝廷之间的朝贡道路基本是畅通的，随着962年正月曹元忠被宋廷正授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甘州回鹘政权和沙州归义军之间的政治关系趋于和缓，而且成为兄弟关系，往来通使不断，“两地一家，并无阻滞”，归义军与甘州回鹘“兄弟才敦恩义，永契岁寒”，“道途开泰，共保一家”^③。笔者认为促成甘沙关系缓和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是962年曹元忠在得到宋朝的官告之后娶于阗皇帝李圣天和非曹夫人所生之女（于阗公主）为妻。曹元忠与于阗王李圣天之间又结成了既是郎舅关系，又是子婿—岳父的双重姻亲关系，正是这种双重姻亲关系，是归义军政权联合于阗对抗甘州回鹘政权，重新打开通向中原朝廷的丝绸之路畅通的一个重

① 据张广达、荣新江研究，于阗天兴七年相当于中原后周显德三年（956）。

② P. 3016V (2)《于阗天兴七年(956)于阗回礼使寿昌县令索子全状》中称于七月七日离开沙州，星驰朔余（快马疾行一个多月），于八月初到达于阗，于八月二十二日朝见于阗王、送上进贡礼。

③ P. 2155V (2)《北宋某年六月弟归义军节度使致甘州回鹘可汗书》。



要安全保障。现以敦煌文献为主进行实证性论证。

1. 于阗公主最早于960年七月十五日之前出现在敦煌

笔者对曹元忠鸟形押的研究表明,押署公文作为归义军节度使在其辖境内行使政治权力的外在表现,曹元忠所使用的鸟形押图形变化,往往跟随曹元忠的政治身份的变化而变化,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①。从956年起至968年,曹元忠使用第五种类型的鸟形押在敦煌文书中出现数量最多,是曹元忠使用最久、也是最后使用的一个鸟形押。它除见于公文之上外,也见于归义军官方的帐簿之中,并提供了一些此型鸟形押使用的时间线索。P.3111《庚申年七月十五日于阗公主舍施纸布花树及台子帐簿》末尾即押署为曹元忠所用的第五种类型的鸟形押(见图1),可知是曹元忠在956-968年期间亲笔押署的公文档案原件,在这件官文书上,首次出现了一位“于阗公主”,其原文是:

庚申年七月十五日,于阗公主新建 官造花树、新花树陆,内:壹是瓶盏树。

又新布树壹,又旧瓶盏树壹,又布树壹、纸树壹。新花菓壹伯陆拾柒菓,又旧花柒拾玖菓,新镜花肆,旧镜花陆(中略)瓶子捌拾肆。

细读这件文献,从文献上残留的清晰的折纸封缄的痕迹,可知这件由下属官员呈报给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籍帐文书是档案原件。根据曹元忠亲笔所签署的鸟形押的特征和时代之间的对应关系,可将文中的庚申年比定为公元960年。再次考察帐簿的内容,在庚申年(960)七月十五日,于阗公主已经出现在敦煌,笔者认为她的到来,一定与前述P.3016V(2)、(3)二件文书中所反映的曹元忠连续于956、958年二次派出进贡使团前往于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因果关系。而俄藏敦煌文献Дх.2148+Дх.6069《于阗天寿二年(964)九月弱婢员孃、祐定牒》中提到的“于阗公主”也就是这位960年七月十五日已经出现在敦煌佛会上的于阗公主,她在964年农历九月之前仍然居住在敦煌,而且由于阗来的亲信婢女员孃、祐定长期服侍,但在964年九月之后这位于阗公主和于阗皇帝一起返回了于阗^②。这位于阗公主也见于不知年代的S.6577V《归义军宴设司申破面状》第一件,其录文如下:

宴设司

伏以今月二日公主下陈钵仓月面九斗,□药面九斗,李悉□□□张悉不面九斗,罗阁梨面九斗、妻面八斗,变诺面九□□□□面七斗、男面三斗,□子面五斗,莲花面七斗、永兴面□□□□三斗。

从此件状文中有限的信息中可以得知,是归义军宴设司的官员向归义军节度使申报某年

① 随着曹元忠从权知归义军节度使马留后使到新授归义军节度使观察留后,再到正授归义军节度使,每一次政治身份发生变化时,曹元忠便在象征行政权力的公文押署(以鸟形押为主要特征)上变换一种图案,这样,曹元忠的鸟形押也就有了类似与归义军节度使的称号、归义军官印一样,有时间坐标参照物的性质,可以通过它判定敦煌文献的年代。

② 似乎这位于阗公主返回于阗之后,就没有再返回敦煌,因此,在现存敦煌文献里已经看不到她的踪迹。

二月因宴设而破除的面帐,公主曾经施舍给陈钵仓(可能是指念经的僧人)月面九斗,那么,这位在960年七月十五日出现在敦煌的于阗公主,在七月十五中元节的佛教盂兰盆会上施舍了数量如此多(总计481件)的由归义军官方所新建或者修造的新旧各色花树、纸树、瓶盏树、花果、镜花、各色灯台子、瓶子、磨睺(Mahoraga)^①川等燃灯、供奉的物品,而且上报节度使,作为档案保存,可见这位于阗公主在归义军政权中的重要性,正在扮演着某种非常重要的角色。她是什么身份呢?与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是什么关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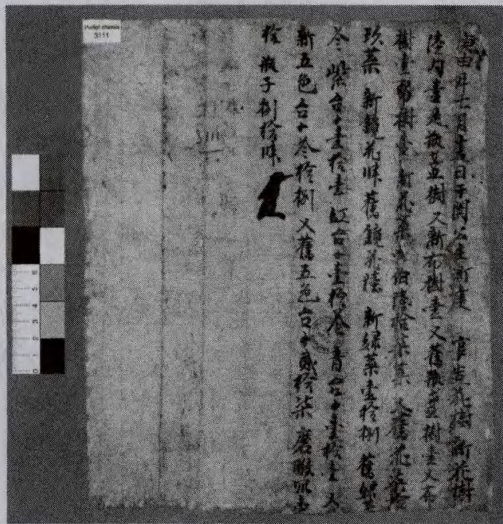


图1 P. 3111 《庚申年七月十五日于阗公主舍施纸布花树及台子帐簿》

2. 于阗公主以曹元忠妻子的身份生活在敦煌

英藏敦煌文献 S. 2144 《某年中元节结坛散食回向发愿文》中隐藏着于阗公主与曹元忠正式结为婚姻的信息。S. 2144 正反面共抄写了三件文书,正面为《韩擒虎话本》,背面先抄写了由不空三藏奉诏所译的《金刚经心法并仪则》,然后接抄了《结坛散食回向发愿文》,从内容判断,似是某年中元节“盂兰盆佛会”时的结坛道场发愿文。文中起首提到奉请诸神前“来就敦煌郡东南角结坛道场五日天(五)夜,受我太傅花果、净香、净灯专主供养。拥护我一郡含生及我太傅、公主,长幼全宅枝罗,并受无疆之福”,将“太傅”与“公主”并称,显然这位“公主”和“太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而据传世文献已知,宋太祖建隆三年(962)正月曹元忠被宋朝正授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②,那么 S. 2144 《某年中元节结坛散食回向发愿文》的写作年代可能在

① 音译作摩睺罗伽等,意译作地龙、大蟒神等,是佛教天龙八部众之一。《维摩经略疏》记载摩睺罗伽是无足腹行之神,因少布施、贪嗜酒肉,遂堕为鬼神。又有认为摩睺罗伽系佛教乐神之类,其形为蛇首人身。

②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8册《蕃夷五·瓜沙二州》,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767页。

962年七月十五日之后,“公主”在归义军中的地位肯定不低,应该就是那位在960年七月十五日已经出现在敦煌的“于阗公主”,大约在962年七月十五日之前,她似乎已经与曹元忠正式结婚,以曹元忠妻子的身份生活在敦煌。

另外,P.3897p1未记录年代的《某年九月支酒残簿》(见图2)中,在每一笔支酒记录后残留有五枚曹元忠所使用的鸟形押。P.3897正面是《佛说八阳神咒经》残卷,P.3897p1是被用来修补此佛经的残片,有研究者据残片内容中提到“太子”、“夫人”,判断是居于敦煌的于阗太子。敦煌文献P.3184记录他们在甲子年(宋乾德二年,964)时还居住在敦煌,传世文献记载宋乾德四年(966)二月,于阗太子德从(从德)来贡方物。前述已经对曹元忠第五种鸟形押的研究表明,P.3897p1的鸟形押可定年在962-966年之间。而帐簿中提到的“夫人”有可能就是“于阗公主”,因为她与于阗太子并列出现。细读此酒帐,支酒用酒的人名多似胡人(如安留件汉儿),多用于帐设宴饮一类(名目有早料酒,午料酒,夜料酒,北宅酒,以及赏赐给下属官员贡纳物品的酒),似乎是在此年(962)的九月有重大的宴庆活动,笔者推测很可能就是与曹元忠和于阗公主的正式婚姻有关系。

P.3897p1暗示在962-966年之间,于阗公主已经在归义军政权内被称为是“夫人”了,即曹元忠已经娶于阗公主为妻,标志着归义军政权再一次与于阗政权进行了政治联姻。那么,这位于阗公主又会是哪位于阗王的女儿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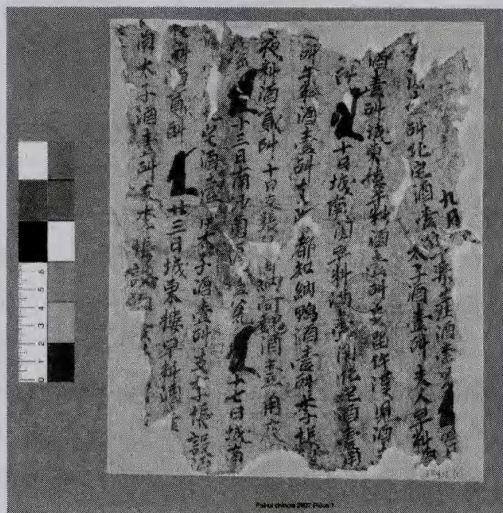


图2 P.3897p1《某年九月支酒残簿》

P.2826《于阗王赐沙州节度使白玉一团信札》是于阗天寿年号(963之后)期间于阗王李圣天写给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书札,在书札中明确称曹元忠为男(女婿类似于子女),从侧面反映了曹元忠迎娶于阗公主为夫人发生在963年于阗王李圣天改

颁新国号为“万寿”年号之前，最有可能就是962年、961年、960年中的某一年，至于具体的年份，由于敦煌文献记录的缺失或者未发现，尚不能确切地知道。

白玉一团

赐沙州节度使男

令公：汝宜收领。勿怪

轻鄙。候大般次别有

信物。汝知。

【通天万寿之印】

其木匠杨君子千万发遣西来。所要不替（惜）也。

凡书信去，请看二印，一大玉印，一小玉印，更无别印也。

【大于阗汉天子制印】

从小印文“大于阗汉天子制印”可知此件的发件人当是于阗国王，但“沙州节度使男令公”是谁？于阗王称其为“男”、直呼为“汝”，似是比于阗王地位低的晚辈。在书札礼仪中，称“男”一般是父母等长辈对子女晚辈的称呼，则“沙州节度使男令公”当是于阗王的姻亲晚辈，书札称其为“男”、“汝”的口气类似于长辈对晚辈书札的口吻。从敦煌文献已知，称“令公”的归义军节度使有曹议金、曹元忠、曹延禄三人，但曹议金称令公时期（928-931-935），于阗尚未得到后晋朝廷“大宝于阗国”的册封，且曹议金嫁女儿给于阗国王李圣天，于阗王作为女婿不可能称其岳父为“男”，故曹议金可以排除；曹元忠是曹议金最小的儿子，曹元忠称令公时期在956-960-974年之间，如果此于阗王是其姐夫李圣天，则李圣天可以兄长的口气称幼弟曹元忠为男、为汝；但已知的敦煌文献明确显示于阗国王李圣天是曹元忠的姐夫，又为何称曹元忠为“男”呢？这不是自相矛盾的难以自圆其说吗？

在未见日本大阪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秘笈中的新材料，即羽686号《于阗皇帝赐归义军节度使男曹元忠书札》之前，大批学界的学者都是囿于于阗国王李圣天与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之间是郎舅关系（即姐夫与妻弟）而不能突破传统思维，而秉持这种观点，笔者在2012年撰写博士论文时也持此种观点。但是，根据日本学者赤木崇敏在日本大阪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秘笈中的新材料，即羽686号《于阗皇帝赐归义军节度使男曹元忠书札》^①中开头第一句话就是“皇帝赐男元忠”，明白无误地证实，此位于阗皇帝与曹元忠之间是类似于父子（或岳父与女婿）之间的关系。至于这位于阗皇帝到底是哪一位于阗王，赤木崇敏和冯培红等学者认为发信人不是李圣天。笔者认为发信人就是于阗皇帝李圣天，因为李圣天与曹元忠之间年龄相差较大，李圣天虽然娶曹元忠之姐为妻，是其姐夫，但在古代一夫多妻风俗之下，如同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有多

① [日] 赤木崇敏《10世纪コータンの王統・年号问题新史料——敦煌秘笈羽686文书——》，《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XXV I I，2013年，第101-128页，pls. III-IV。

位妻子一样,李圣天应当有多位夫人,在李圣天在位的晚年某一年,李圣天将与除曹夫人之外的夫人所生的女儿下嫁给了曹元忠,又与曹元忠结成了岳父与女婿之间的姻亲关系。因此,于阗皇帝李圣天才可以称曹元忠为“男”,即类似于父子关系,而且可以在书札中直呼其为“汝”。另外,核对羽686号《于阗皇帝赐归义军节度使男曹元忠书札》上所钤盖的汉文官印是否与P.2826《于阗王致曹元忠书》所钤盖的那枚小印“大于阗汉天子制印”是否完全相同,也是判断此位于阗皇帝与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关系的一个方法与途径:如果二者的尺寸大小、文字相同,自然可以证明是同一位于阗皇帝。因为敦煌文献部分地显示了每一位于阗皇帝继位之后,其所用官印是并不相同的。

由于日本藏敦煌新材料的出现,已经暗示了于阗王李圣天将他与除曹夫人之外的夫人所生的女儿下嫁给了曹元忠有非常大的可能性。根据古藏文研究专家王尧、陈践对Pt.1284《河西节度使曹太保致父于阗王书札》所做的汉文译文中,此归义军节度使曹姓太保称李大王为“父王天神狮子李大王”,与P.2826和日本大阪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秘笈羽686号《于阗皇帝赐归义军节度使男曹元忠书札》中曹元忠与于阗王之间是一种类似于父子关系的姻亲关系是非常一致的,因此,从三者之间内在逻辑和时间关系上(基本上都是在于阗天寿年间)考虑,可以明确地证明李圣天与曹元忠之间除了在于阗王执政早期存在众所周知的姐夫-妻弟的姻亲关系之外,更在于阗王李圣天执政的晚期存在岳父-子婿的姻亲关系,是于阗政权与归义军政权双重互换姻亲“政治联姻”的一种密切表现。

冯培红进一步创造性地将Дх.2148+Дх.6069《于阗天寿二年(964)九月弱婢员孃、祐定牒》中提到的于阗“佛现皇帝”推断为于阗王李圣天,“于阗公主”当是曹元忠之妻,是于阗王(但不是已经去世的佛现皇帝李圣天)下嫁给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女儿^①。她在964年农历九月之前从于阗嫁到敦煌并居住在敦煌,由于阗来的婢女长期服侍,而在九月之后则与于阗皇帝一起返回了娘家于阗。笔者还可以补充数条964年左右时,于阗公主作为曹元忠的妻子生活在敦煌的敦煌文献材料:在有明确纪年的《曹元忠夫人翟氏施舍经巾发愿文》中记载:乾德二年(964)四月廿日,“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敦煌王曹公之凉国夫人、浔阳翟氏敬造五色绣经巾一条,施入窟内”,她在发愿文中祝福“皇后天年永久,四海荷霖霖之恩波,大王神算遐长,七郡布殊常之德化。夫人心愿:愿玉叶金枝、衙佑柔僚、宫苑侍女,并皆安乐”,笔者认为此“皇后”就是指“天皇后”^②,即于阗王李圣天的皇后曹氏,“玉叶金枝”自然是指于阗王的子女——于阗太子和于阗公主。据此推断,于阗王及曹皇后曾于964年四月之

① 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第9章第2节“曹元忠娶于阗皇帝之女为妻”,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43-344页。

② 有无曹元忠夫人翟氏称呼“于阗公主”为“皇后”的可能呢?笔者认为可能性较小。

前已经到达敦煌,也许是曹皇后省亲而来。在 P. 2733《礼佛施舍发愿文》中,某僧人在提到“府主大王”和“夫人”之后,马上祝愿“太子、公主义安,比贞松而不变”,笔者判断此“太子”就是于阗太子,而“公主”就是于阗公主,与 P. 2726《比丘法坚发愿文》中所提到的排在“大王、梁国夫人”之后的“公主”、“太子大师”都是同一个人,都发生在 964 年九月之前。在众多敦煌文献的证据里,于阗公主的地位在归义军政权内仅次于曹元忠的原配夫人翟氏。那么,这位于阗公主的身份只能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另外一位妻子,才能符合敦煌文献里显示的身份和地位。

综上所述,笔者推测在于阗王李圣天执政的晚期——天寿年号期间(963-967)或者更早,大约在 960 年正月之后,曹元忠派往于阗迎娶于阗公主的富住使团返回敦煌之后,于阗公主也随之来到了敦煌。在 962 年七月之前,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已经迎娶了于阗公主为妻子,归义军政权与于阗政权再次政治联姻。963 年于阗王改年号为“天寿”^①之后,作为曹元忠的岳父,以长辈的身份给曹元忠写信并赏赐于阗白玉等做为礼物,并于 964 年九月之前,于阗王和曹皇后曾来敦煌探望女儿,之后于阗公主便随于阗王等使团返回了于阗。

三、宋朝再授曹延禄官告:再次迎娶于阗公主的一个政治因素

曹延禄是曹元忠之子,他在年幼时也被送到净土寺内作为学郎学习基本的文化知识。日本羽田亨旧藏敦煌文献(今归杏雨书屋藏)663 号背面有一题记“净土寺学郎曹延禄”,表明曹延禄在年幼时遵循曹议金时期将曹氏子弟送入寺学中接受文化知识教育、文书行政培养的传统,也被送到净土寺内去学习。长大成人后的曹延禄也在曹氏归义军幕府内接受行政锻炼,先后曾在归义军政权内任押衙(将仕郎爵)、节度行军司马、瓜州刺史等官职。Дх. 1400、Дх. 2148、Дх. 6069 (2)《于阗天寿二年(964)新妇小娘子阴氏上天公主起居状》,新妇小娘子阴氏为曹延禄之妻,证明在 964 年左右时,曹延禄已经成婚,长大成人,在归义军使府内担任军职。而只所以她要以新妇的身份给于阗公主上起居状,原因就是在 964 年之前,曹元忠迎娶了于阗王李圣天之女于阗公主为妻,相当于她的“婆婆”。Дх. 1400、Дх. 2148、Дх. 6069 (2)《新妇小娘子阴氏上于阗天公主起居状》,时间也在于阗天寿二年九月,据张广达、荣新江的考订,于阗天寿二年即公元 964 年^②,时当北宋乾德二年。964 年左右时阴氏刚刚成为新妇,被称为“新妇小娘子”。也就是说,在 960-964 年期间,在敦煌归义军政权内曾经发生过曹元

① 张广达、荣新江在考订于阗国年号及世系时,考订于阗王李圣天统治于阗国五十余年后改元“天寿”年号的原因,当与隋文帝五十大寿时改元“仁寿”年号一样,为已颂寿。“通天万寿之印”的印文也从侧面证实于阗王李圣天不仅改了年号,而且铸了新的印章,以示寿辰纪念。

② 张广达、荣新江《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载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5-37 页。

忠娶于阗公主为妻,也给其子曹延禄娶妻阴氏这样“双喜临门”的事件,故作为新妇的阴氏要给作为其“婆婆”的于阗公主行起居状,问候公主的身体起居。笔者认为,曹延禄娶阴氏夫人的时间,应该晚于曹元忠娶于阗公主的时间,约在963-964年之间。

季秋霜冷。伏惟

公主尊体起居万福。即日新妇小娘子阴氏蒙恩。不审近日

尊体何似。惟以时倍加 保重,远情所望。今

于押衙安山胡附漆縠子一匹,到

日以充丹信,收领也。谨奉状 起居。不宣,谨状。

九月日新妇小娘子阴氏 状上

公主 陛下 谨空。

又阿孃寄 永先小娘子信:青铜镜子一面,到日

永先收留也。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2件状文中“阿孃(娘)”和第1件“别纸”中的年世已高的“娘子”都是指曹元忠的原配夫人凉国夫人翟氏,即曹延禄的生母,阴氏自然称其为娘。曹延禄之妻阴氏不仅向已经返回于阗的于阗公主问候起居,还通过于阗公主向于阗国宰相求取绢、壁画颜料、钢铁、弓箭武器、玉石物品,甚至是用于治疗曹元忠原配夫人身体疾病的药物。从内容看,似乎不像是新妇小娘子亲笔所写,而是由归义军政权内的文士为其代笔而写。笔者推测,可能更是曹延禄的授意,利用于阗政权和归义军的姻亲关系为归义军政权获取到更多的利益。

宋开宝七年(974)曹元忠去世,曹延恭继承归义军节度使权力,曹延禄就以归义军节度副使的身份出任瓜州刺史。不久,在归义军政权内也许发生了某种政变更替,976年由曹延禄继承归义军节度使权力。曹延恭、曹延禄相继执掌归义军之后,甘州回鹘再次阻断河西道路,宋朝不知归义军节度使更替的消息。约6年之后,迫使归义军政权再次寻求与于阗的政治联姻,大约于981年前后,曹延禄得到宋廷派出使者亲自前往敦煌班赐的归义军节度使旌节之后,极大鼓舞了于阗政权第三次要和归义军政权联姻的信心。敦煌于阗文文献记载,于阗使团于982年七月曾经派出了一个的庞大使团,请求曹延禄迎娶于阗公主^①。于是,曹延禄便迎娶了于阗金玉国皇帝尉迟达磨的第三女天公主李氏为妻。在敦煌莫高窟天王堂塔内东壁题记、榆林窟中的壁画上留下了许多供养人题记可以明确的证实,兹不多述。笔者认为,正是981年宋朝授予曹延禄归义军官告、旌节使团亲自到敦煌的到来,是促成归义军政权与于阗政权第三次政治联姻的一个最重要的政治因素,现予以详细考证。

P. 4525V (9)《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致番官首领委曲》中所言“当道今差使人入

^① [日]金子良太《敦煌出土张金山关系文书》,《丰山学报》第19号,1974年,第114-115页。笔者未见原文,此处据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第349页。

贡天庭，经过路途，到汝部落地界之时，仰准例差遣人力防援般次，前公在路，勿至滞留踈失”，文末有一鸟形押，虽然没有明确的年代，但其鸟形押的特征归属于曹氏归义军时期的曹延禄。P. 4525 正面为废兑的佛经，背面有宋太平兴国六年（981）的养女契约、太平兴国七年（982）“白侍郎门下学仕郎某乙到院内领讞”题记。背面第4件提到癸未年八月廿二日将兑纸人目，癸未年被判定为宋太平兴国八年（983），背面第7件是辛巳年（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八月都头吕富定上太傅牒，背面第12件是太平兴国某年十月内亲从都头知瓜州衙推某牒。因此，判断写在第7件和第12件之间的P. 4525V（9）“委曲”，写于太平兴国年间^①，其内容是某年夏月，归义军曾派出使人入贡宋朝朝廷，经过管界内的少数民族部落时，写信给番官首领，请其保护使团的安全。另外，据P. 3827 奏状、P. 3660V 牒文，都是太平兴国四年（979）四月以后曹延禄派使团进贡宋朝有关，因此判定P. 4525V（9）“委曲”末押署的鸟形押为979年夏月（五六月），正好与P. 3827 + P. 3660V 奏状、牒文反映太平兴国四年（979）四月以后，权知归义军留后曹延禄派出使者进贡宋朝的事实互相验证。

传世史书记载：太平兴国五年（980）闰三月辛未日，归义军进贡使臣经过了约十一个月的跋涉到达宋廷东京汴梁（开封），在出土的敦煌文献里也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安徽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二娘子家书》中记载“至今年闰三月七日，平善与天使司空一行到东京”，李正宇先生据唐宋时期的置闰特征，推断“闰三月”即为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恰恰与正史资料记载的归义军使人于本年闰三月辛未（二十八日）入朝纳贡非常契合^②。于是，在980年四月，宋廷制授曹延禄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营田押蕃落等使。在《宋会要·蕃夷志》中明确记录曹延禄的检校官衔为太保^③：

制：权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譙县

〔开国〕男曹延禄，可检校太保、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营田押蕃落等使。^④ 980年四月宋朝授曹延禄“检校太保”之后，还专门派出了沙州官告使，携带朝廷官告及信物与归义军使团一同返回敦煌，于980年腊月终于来到了敦煌，在敦煌文书档案中留下了蛛丝马迹。P. 3438V（其实应为正面）《沙州官告国信判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王鼎上太保启状》正是宋朝派出的沙州官告国信判官王鼎到达沙州授予曹延禄归义军节度使官告一事的反映，现将第二件予以录文如下：

鼎启：早者出于非次，辄贡刍菟，

① 张广达据文末的鸟形押与P. 3878上的鸟形押相同，判定为979-980年。上参张广达《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使次和般次》，《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38页。

② 李正宇《安徽省博物馆藏敦煌遗书〈二娘子家书〉》，《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

③ 从敦煌文献已知，曹延禄在976年出任权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时，在归义军境内即自称太保，但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四月曹延禄给宋廷的奏状P. 3827《曹延禄奏状》中结衔为“权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这当然是曹延禄谋求进贡宋廷以获得正授节度使的权宜之计。

④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卷198《蕃夷五·瓜沙二州》，第7767页上。

只希

钧慈详鉴，岂敢忘于

霑救。今则伏蒙

太保迺开 府库，特惠

琼瑶，睹美玉而如窥秋月，视润

色而室内生光，谅兹皎洁实谓

国珍。辞让既以不敢，即当捧当而合

懼。寻依

台旨□授讫。谨修状启

闻陈

谢。伏惟

照察。谨状。

十二月六日沙州官告、国信判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王 鼎 状

P. 3438V《沙州官告国信判官王鼎上归义军节度使太保启状》一共有四件，第一件前部略有缺损，后三件保存完好。根据四件启状的书写特征，当是书札原件，且是经过了传递的实用书状，是某年十二月四日和六日从中原来到沙州授予官告、国信的使臣王鼎上给归义军节度使太保的。这四件启状在上给归义军节度使太保之后，曾被精心地将四件启文粘连成一个长卷保护起来，在背面卷首处题署“辛巳年三月封”应当是归义军政权内重要的档案封存。由此推断正面的启状书写时间当是辛巳年之前的庚辰年十二月。这四件启状档案后来被废弃，流入了佛教寺院里，被僧人用来抄写《大般涅槃经》中的难字音义，书法遒劲工整，与敦煌文献中一般学士郎的书迹不同，可能是一位有学问的僧人所用。背面题署的“辛巳年三月”有可能是宋太平兴国六年（981）、五代后梁龙德元年（921）、唐咸通二年（861）中的某一年。根据学界对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年代的研究成果^①，咸通二年时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尚无太保称号，当其死后（咸通十三年，872）才被追赠为太保；龙德元年时归义军节度使曹仁贵（议金）称尚书、仆射，也无太保称号，因此都可以排除。只有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获得宋太宗制授归义军节度使时，可以称太保，与史实最为相符。

根据以上史料双重验证，环环相扣，合如符契，证明 P. 3438V 沙州官告国信判官王鼎上归义军节度使太保启状书写于太平兴国五年（庚辰）十二月四日和六日。这是因为宋京师汴京距离沙州路途遥远，宋朝派出的官告、国信判官王鼎等中原使团大约花费了数个月的时间才在庚辰年（980）十二月初抵达沙州，受到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的酒宴招待（第一件、第三件），并赐予美玉作为礼物（第二件）。第二件启状是王鼎在收到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于宋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六日所赏赐的美玉之后，给曹延禄所

①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60-147页。

上的陈谢启状，第四件则是归还美玉上给曹延禄的启状。

另外，S. 2472V (6) 牒文可佐证在 980 - 981 年之间曹延禄获得旌节的情况。S. 2472V (6) 《辛巳年 (981) 十月三日算会州司仓公廨斛斗牒》是一件牒文的抄件 (见图 3)，是归义军府衙将 980 - 981 一年以来支用的官仓粮食进行年终算会后向节度使报告，现将主要关键信息录文如下：

辛巳年十月三日算会：州司仓公廨斛豆前主持第五队押衙（下略）内除一周年迎候 阿郎娘子及诸处人事吊孝买布、酒等事价，拜节帖设肉价，并修仓供工匠，计用得麦（下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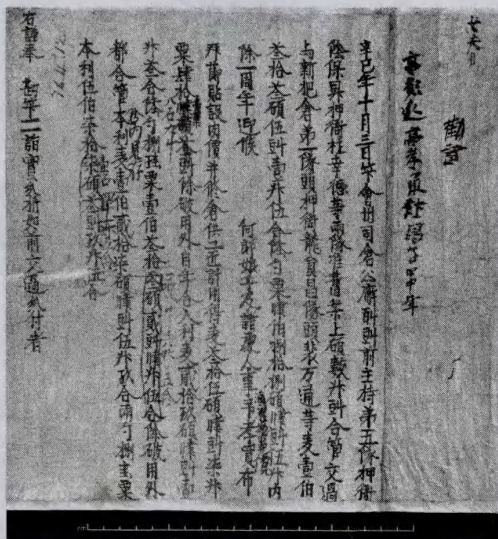


图3 S. 2472V (6) 《辛巳年 (981) 十月三日算会州司仓公廨斛斗牒》

文中提到沙州仓司在辛巳年 (981) 十月份将 980 年十月以来的一年内破用的粮食进行了计算，“内除一周年迎候阿郎娘子及诸处人事吊孝买布、拜节帖设肉价并修仓供工匠”破用麦数量，而“拜节”，笔者认为即是指归义军长官阿郎拜谢中央所授予的归义军节度使旌节。证实 980 年十二月底宋朝使者王鼎等抵达沙州，授予曹延禄节度使旌节、官告时，归义军使府曾经宴设宋廷使团，从侧面也证实 P. 3438V 启状写于庚辰年腊月。

综上所述，敦煌文献与传世文献证明，太平兴国四年 (979) 四月以后，权知归义军留后曹延禄派出使者携带奏状进贡宋朝，太平兴国五年闰三月沙州朝贡使人跟随宋朝使人顺利到达宋廷，四月宋太宗制授曹延禄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保^①，980 年十二月

① [清]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卷 198《蕃夷五·瓜沙二州》，第 7767 页上。

初,沙州官告、国信使王鼎抵达沙州^①,授曹延禄太保官告及旌节,宋朝铸赐的“归义军节度使之印”传入沙州^②,河西走廊朝贡的政治道路再次开通。这正是促成于阗政权主动提出和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进行联姻,下嫁于阗公主的一个主要的政治因素。

四、结论

五代宋初的曹氏归义军政权,虽然是一个隔离于中原王朝的所谓“独立”政权,但是,成为中原王朝的“外藩”、依靠中原王朝的天威保证其政权安全、保持河西走廊朝贡政治之路的通畅,一直是历任曹氏归义军节度使追求的首位的行政目标。由于甘州回鹘地处丝绸之路河西走廊西段通往中原腹地的交通要道上,对归义军政权而言,甘州回鹘政权犹如一枚扎在归义军政权血管里的刺,时刻紧扼着归义军政权的命脉——通往东边中原王朝的朝贡政治道路的通畅。因此,曹氏归义军节度使都将甘州回鹘视为是归义军辖境东边最危险而强大的敌人,时时刻刻无不警惕。但在曹元忠、曹延禄父子任归义军节度使的时代,十分注意吸取前任节度使或率军攻打甘州回鹘政权、或以外交手段成功打通甘州回鹘政权阻绝的道路,正反两方面的对甘州回鹘的政治策略与政治经验,总体上对甘州回鹘采取守势以自保,而不是军事挑战为主,同时向广阔的西域积极争取于阗政权作为军事同盟,以加强抗衡甘州回鹘的力量,借助其力量保障河西走廊朝贡政治之路的通畅。

为此,归义军政权与周边诸民族政权中最为强大的甘州回鹘和于阗保持了联姻关系,尤其是和于阗政权的联姻,在五代宋初中原王朝政治混乱、无力重振丝绸之路的政治环境下,为保证归义军政权的生存和发展,保证向中原王朝进贡称藩的朝贡之路、商贸之路、文化之路的畅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敦煌文献,我们发现,曹氏归义军政权在得到中原王朝班赐的中原王朝承认的、以归义军节度使的政治身份所确定的“政治授权”之后,往往是促成归义军政权和于阗政权联姻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即,只有归义军政权主动地纳入到传统中原政权的“藩属体系”之后,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才会将归义军政权与己政权的“独立”属性相区别,视其为中原政权的一部分,而不敢轻易吞并它。这正是五代以来曹氏归义军政权生存发展的政治智慧所在。

① P. 3438V《某年十二月沙州官告国信判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王鼎上太保启状》。

② S. 4453《宋淳化二年(991)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帖寿昌都头张萨罗赞、副使翟哈丹等》。